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劝学篇

冯天瑜 姜海龙 译注



中華書局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
经典
名著

冯天瑜 姜海龙◎译注

劝学篇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劝学篇/冯天瑜,姜海龙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11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11963-3

I. 劝… II. ①冯…②姜… III. ①政治思想—中国—近代
②《劝学篇》—译文③《劝学篇》—注释 IV. 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2112 号

-
- | | |
|-------|---|
| 书 名 | 劝学篇 |
| 译 注 者 | 冯天瑜 姜海龙 |
| 丛 书 名 |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
| 责任编辑 | 张彩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½ 字数 250 千字 |
| 印 数 | 1—8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1963-3 |
| 定 价 | 25.00 元 |
-



前言

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1901年,敏感的梁启超指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第82期)。

面对这种旷古未有的“过渡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但对“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案又各不相同。就清朝统治阵营内部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分化出保守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保守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企图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去抵挡西方工业文明的来袭,他们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教条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

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训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訢、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者。

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举入侵与不堪忍受外来侵略和专制压迫的人民揭竿而起这两方面的严重挑战。清廷权衡“御外夷”和“靖内寇”的轻重缓急之后，确立了“靖内寇为先”的方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洋务派便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所经营的“制器”、“练兵”、“兴学”等事业，显示了追求近代物质文明的趋向和对外部世界有限的开放态度，从而为中国脱离中世纪故道，纳入近代世界轨迹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的事业又未能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文化体系的框架，他们学习西方技艺，已由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变为“师夷长技以制民”。洋务派所追索的“过渡之道”并非要通向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而是在保存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实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近代化改造。洋务派的这一基本特征，在这个派别的后期巨擘张之洞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得到充分展现。

19世纪后半叶，与洋务派相伴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人也开始了自己推进“过渡之道”的活动。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19世纪中后期登上舞台的西方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给中古末世开明士人带来的觉醒。中国的改良派力倡发展新的生产力，进而倡导学习与这种新生产力相共生的西方科学技术、人文科学以至社会理想，从而成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社会批判的锋芒，其指向已不限于保守派的冥顽不灵、深闭固拒，而且还指向洋务派的种种弊端。他们揭露洋务大吏不过是“以洋务为终南捷径”（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学习西法二十余年来，徒袭其皮毛而已”（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卷十,《火器说略后跋》)。一些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开始鼓吹变法,成为19世纪末叶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先声。

如果说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的某些人,例如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多为洋务大吏的幕僚,依附于洋务派,寄希望于洋务派,企图通过自己的劝谏和建策帮助洋务大吏完成“自强”事业,那么,稍后的何启、胡礼垣生活于西风较烈的香港,目睹了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并感受到民营工商业在“官督”之下的艰难困顿,从而产生摆脱洋务大吏政治控制、经济束缚的要求。于是,他们明确地与洋务派分道扬镳,并且力图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发出了求“民权”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还相当微弱、怯懦。何启、胡礼垣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们1899年合撰的直接反驳张之洞《劝学篇》的《〈劝学篇〉书后》中。

二

《劝学篇》的作者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开展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游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19世纪的最后几年,张之洞于湖广、两江经理各项洋务实事的同时,也以老谋深算的重臣身份,参与此间谲诡幻化的政治斗争。在第一

次暂署两江期间,因甲午战争中方惨败的刺激,康有为等人受帝党支持,于1895年8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力倡“变法”,张之洞捐五千金,列名北京强学会。10月,康有为南下江宁,运动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上海和南京分会,张“颇以自认”,遂为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不久,慈禧在北京压迫强学会,将帝师翁同龢的两名重要助手革职,示帝党以颜色。张获悉后党反攻消息,立即改变对强学会的态度,借口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下令封查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授意以该报余款交汪康年,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该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数月间,风靡海内外。已于1896年2月返任湖广的张之洞曾对《时务报》表示特别的器重,札飭湖北全省官销,并著文赞扬该刊“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飭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六册)。《时务报》创刊发行期间,维新变法运动正向纵深进展,光绪帝也愈益明确地予以赞许,张之洞便试图密切同维新派的联系。1897年元月邀请《时务报》撰述(主笔)梁启超访鄂,待为上宾。然而,《时务报》犀利的政论文章又常常引起张的惊恐,尤其是1897年10月该刊第四十册所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谴责清廷丧权辱国。张立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称梁文“太悖谬”,并令“此册千万勿送”,又授意梁鼎芬致函汪康年,掣肘梁启超。第五十六册以后,该刊即为汪康年、梁鼎芬控制,宗旨大变。对于湖南维新派组织南学会及《湘报》《湘学报》等维新刊物,张也是始而支持,继而扼杀。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蜚语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他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这样,既是为着捍卫纲常名教,也是“预为自保计”,张之洞于1898年4月撰写了《劝学篇》。

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金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

可见，张之洞写《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保守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保守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其实，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做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更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而作为那一时代的特定产物，《劝学篇》攻击的重点，是被他指为“邪说”的维新理论。诚如张氏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在戊戌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目的在“绝康梁并谢天下耳”（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第9页）。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可动摇；所谓“通”，指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然而，张之洞所说的“西政”虽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却对“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外篇·设学第三》）。

可见，张氏唯恐西学中那些锋芒直逼君主专制制度本体的内容在中国得以传播。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

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第十三》）

出于对无力“应世事”的君主专制顽固派那套僵化思想的不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多处批评“守旧者”的“不知通”，而“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劝学篇〉序》），他责备守旧者对新学的拒绝是“因噎而食废”（《〈劝学篇〉序》）。并在《劝学篇》的外篇中力主“益智”、“游学”、“广立学堂”、“译西书”、“阅报”、“变法”、“变科举”，倡导发展“农工商学”、“兵学”、“矿学”，主张筑铁路以通血气，会通中西学术以晓固蔽。鉴于国民精神的不振作，张之洞还大声疾呼“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为印度）、“知变”、“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这些思想言论中无疑包蕴着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合理的、进步的成分。

然而，张之洞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个专制王朝的封疆大吏，作为一个深受理学熏染的士大夫，他对纲常名教又是全力维护的。他在《〈劝学篇〉序》及《内篇·明纲第三》里揭起了“三纲至上”的旗帜，认定“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在《内篇·正权第六》里，张之洞集中攻击了民权论。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张之洞还竭力颂扬清朝的“深仁厚泽”与“良法善政”，认为这一切妙不可言，“何必袭议院之名哉！”他甚至为清廷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行径辩护，说朝廷“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内篇·教忠第二》）。

《劝学篇》虽有“劝工、劝农、劝商”之倡，但限制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轨范之内。张之洞说：“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内篇·正权第六》）

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官权的保护之下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却证明,正是强势官权阻碍了工业化的步伐。可见,张之洞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是不足为训的。当然,《劝学篇》外篇关于学习西政、西艺的主张,包含着不少开明意见,它们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学习并推行西方技艺、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的全面概括。

《劝学篇》刊行的时机,也活生生地昭示了这部著作特有的政治色彩。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内篇力辟民权论等“维新”理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

者阅读和理解。注释之外,本书首次对《劝学篇》进行了全文的白话文翻译,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读懂原文,资以参考。对《劝学篇》的白话文翻译,遵循着求真和达意的原则,一方面,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不做脱离原文内容的发挥。在此前提下,对原文言说内容进行反复咀嚼和归纳,力争使白话译文流畅易读,得原文精髓。本书由冯天瑜与姜海龙合作完成。限于学力,其中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方家指正。

冯天瑜

2016年5月30日

目录

前 言	1
上 谕	1
《劝学篇》序	3

内 篇

同心第一	21
教忠第二	39
明纲第三	72
知类第四	80
宗经第五	91
正权第六	106
循序第七	119
守约第八	125
去毒第九	157

外 篇

益智第一	164
游学第二	179

设学第三	189
学制第四	201
广译第五	207
阅报第六	216
变法第七	222
变科举第八	235
农工商学第九	255
兵学第十	270
矿学第十一	285
铁路第十二	292
会通第十三	298
非弭兵第十四	319
非攻教第十五	326
附录 张之洞传(清史稿)	334

上 谕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①，奉上谕^②：“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③，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④，俾得广为刊布^⑤，实力劝导，以重名教^⑥，而杜厄言^⑦。钦此^⑧！”

【注释】

①光绪二十四年：即 1898 年。光绪为清德宗年号（1875—1908）。

②上：指光绪皇帝。

③翰林院：官署名。清代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记载起居注，进讲经史，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侍讲：唐以来备君主顾问的官员。明清时为翰林院额定之官，掌记载撰著等事。黄绍箕（1854—1908）：清流党人黄体芳之子，1898 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戊戌政变后，擢左春坊左庶子，派充京师大学堂总办。

④军机处：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十年（1732）设置，宣统三年（1911）内阁成立后撤销。督：总督简称。清代地方最高长

官，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军民要政。抚：巡抚简称。清代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总揽一省军事、吏治、刑狱等，地位略次于总督，仍属平行。学政：清代提督学政的简称。因兼考武生，故加提督衔。人选由翰林官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中选派，三年一任，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

⑤俾(bǐ)：使。

⑥名教：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礼教。

⑦卮(zhī)言：《庄子·寓言》：“卮言日出。”陆德明《释文》引王叔之云：“夫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已无常主者也。”后人常用为对自己著作的谦称。这里指那些违背圣贤名教的言论。

⑧这段文字为光绪皇帝的上谕，原以红字刊于《劝学篇》首页。

【译文】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光绪皇帝的上谕：“本日翰林院上奏侍讲黄绍箕所呈进的张之洞所写的《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我仔细地批阅了，该书立论公平正大而又通情达理，对于学术、人心大有好处。现在我命令将所准备的《劝学篇》四十部副本，由军机处颁发给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各一部，使该书广为刊发印行，大力劝导士民，尊重儒家礼法秩序，杜绝违背圣贤名教的言论。钦此！”

《劝学篇》序

【题解】

张之洞为什么要在“百日维新”之际写《劝学篇》？为什么要托付门徒黄绍箕进呈给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在道器两个层面，皆有其复杂而值得阐发的原因。从“应世事”的角度来看，《劝学篇》的写就和进呈，体现了张之洞“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巧宦一面。康梁为首的激烈变法，张之洞最初曾涉入其中，1895年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张之洞捐银入会；梁启超在上海所办《时务报》，张曾札饬湖北官场销售。但随着变法的推进，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很快体悟到变法背后的帝党、后党之争，权力的天平始终倾斜在后党这一面。为了摆脱自己曾经襄助维新派的前史，“预为自保”于纷繁复杂的政事纷争中，以疆臣之笔“正论”如何务本会通，揭康梁之“邪说”，无疑是政治上的妙笔妙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劝学篇》写的恰逢其时。戊戌政变之后，曾有人以张之洞与维新派有染为由，请朝廷治罪。慈禧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之名，未惩处张之洞。张之洞1909年故去，清廷的祭祀文中有“诏荆楚之髦士，劝学成书”的赞语，可见《劝学篇》于张之洞一生宦海浮沉的重要。中国的改革举措中的甲乙丙丁固属重要，但具决定性的往往是改革中人事与权力的较量。

《劝学篇》的写就不仅仅是“应世事”之举。在与康梁接触的过程

中,张之洞与维新派渐行渐远。从根本上说,理学的熏陶、封疆大吏的政治身份与洋务派巨擘的定位,都使张之洞不能赞同康南海的激进之论。《劝学篇》的写就,带有阐发己论,驳斥保守与激进者两面作战的意味。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曾回忆说:“我曾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劝学篇》是在那次会议之后‘立即写出来的’。”

《劝学篇》也不仅仅是驳斥“邪说”那么简单。事实上,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曾国藩与张之洞“偏文”,李鸿章、左宗棠“偏武”。而就经营洋务、布行新政的经验与时间来看,以李鸿章、张之洞为最,曾、左两人早逝。过往时人与史学者常讥评洋务运动只注重器物层面的建设,不注重西政西制,对此未有理论上的概括和阐发。张之洞《劝学篇》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偏文”和“洋务”的结合,使张之洞成为躬身实践的大吏中最具可能将洋务实践上升为经验总结的人选。口岸知识分子与改良派幕僚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或者摇笔过之,但未有擘画洋务的实际经验。李鸿章办洋务最有成效,但在“治学”、“文章”上重视不够。所以,是张之洞的《劝学篇》成为基于洋务经验而又有所超越的经典文本。张之洞的洋务经验即来自于湖北的洋务、新政实绩。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湖北假张之洞影响了晚清的变革,而晚清的变革又深深塑造了湖北的近代命运。

《劝学篇》同时也不仅仅是洋务的总结。在文化层面,《劝学篇》中所提出的“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响亮口号,是对自明末清初以来四百余年间“中西会通”问题所做的一个系统性回应。自徐光启遭逢利玛窦以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中西文化涵化拉开序幕。但在不同时代,如何应对中西会通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古今问题、本末问题、体用问题、新旧问题,不能一也。张之洞所处的晚清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国势日蹙,迫使士人去思考文化会通层面这一大问题。“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系统性地回答了这一文化交流层面的大问题。尽管